

试论李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黎 文

(一)

李贽(公元1527—1602年)这个被反动儒家骂为“非圣无法”、“异端之尤”的反理学斗士,他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的理论基础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历来就有不同的评价。有的人认为李贽赞赏过王阳明,晚年又信佛教,是个唯心论者;有人认为李贽讲过“形、神,两物也”,近于二元论;还有人认为李贽早年具有唯物论倾向,晚年堕入了唯心论。今天,深入评法批儒,正确总结哲学战线上儒法斗争与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有必要重新剖视李贽的哲学思想,从路线上把握他的哲学思想的主流,分析他的哲学思想的党派性,会有助于理解哲学斗争从来是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普遍规律。

李贽一生从事于反孔批儒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他自豪地宣称,自己“心上无邪”,“身上无非”,“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世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这个“正兵”,即他用以向儒家唯心主义路线发起进攻的真正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他从“百姓日用”的生活实践中体会到、并在反理学斗争中磨炼出来的朴素唯物论。

毛主席教导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李贽的朴素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是在与宋明唯心主义理学作短兵相接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宋明以来,适应官僚大地主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由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等反动理学家出来把孔孟之道加以发挥,使儒家的唯心主义哲学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后期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始终把程朱理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主要的思想统治工具。

程朱理学利用人类认识过程中关于一般的抽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可能,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先,有一个所谓“太极”或“理”,并把所谓“太极”、“理”说成是“生物之本”,是产生物质世界的精神本体,是支配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朱熹从这套极端荒诞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虚构出发,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其鲜明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官僚大地主专政的封建特权统治。

李贽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他以眼睛向下的精神,首先从思想路线上,反对“架空而臆说”,主张“道不虚谈”,“学务实效”。他着重剥去道学家们吹得神乎其神的“天理”的神圣外衣,明确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把所谓“人伦”和“物理”,还原为老百姓“穿衣吃饭”等基本物质生活;离开人类物质生活,离开“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就再没有什么人伦物理。他强调,这是他在实际生活中

“实证实得”的真理，所以一生“不识讳忌，时时提唱”。正是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李贽一脚踢开了宋明道学家们的无数臆说，并把儒家唯心主义的各种虚伪说教，通通斥为“画饼之谈”，“不根之论”，而加以明确的否定。

在世界统一于什么的哲学基本问题上，李贽继承和发挥了王充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鲜明地提出了“盈天地皆物”、“盈天地间，皆是生气”等朴素唯物主义的命题。他认为，充满天地的物质存在，就是“气”；“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流行不息”，就是天地人物产生的开端。他说：“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从根本上说，天地好比一对夫妇，“有天地然后有万物”。通过这样朴素的论证，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反动的唯心主义理学，指出道学家们鼓吹的所谓“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等等，通通是无稽之谈，“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就是说，在阴阳二气之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理”或“太极”。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客观唯心主义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了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李贽进而有力地反问：如果按照唯心主义者所说的“二生于一”，那末，“一”又有谁来派生呢？李贽抓住客观唯心主义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反复穷诘：“一者果何物？”“理者果何在？”“太极者果何所指？”从而无情地暴露了“理在事先”的唯心主义理学的荒谬。

李贽基于“盈天地皆物”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程朱“道在事外”的唯心主义。程朱理学按照唯心主义的颠倒世界观，在物质世界之上虚构出一个“形而上”的“道”。这个“道”，被说成是“神化了的绝对”，既支配着自然界的一切，又主宰着人类社会的命运，而只有所谓“圣人”，才能“循而行之”；因而，又在现实历史之外编造出一个“道统”，说什么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丘到孟轲，有个一脉相传的“道统”，到孟轲死后就中断了千多年，直到程、朱一伙出来，又才接上。这一切，不过是宋明时期官僚大地主集团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权力而由程、朱一伙骗子编造出来的谎言。

李贽针对程、朱这些反动说教，提出“人无不载道”的反对命题，否定了有什么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道”。他把“道”比为“水”，“人”比为“地”，“地”和“人”是“水”和“道”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水”不能离“地”而存在，“道”不能离“人”而独存，“道不离人，人不离道”。既然“水”存在于“地”中，“道”存在于“人”之中，那末，在“人”之外就不存在什么“道”，李贽说：“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这样，就把高高在上的“道”，从天上还原到人间，从而有力地否定了程朱“道在事外”的唯心论。

李贽从“人无不载道”出发，揭露了程朱编造的“道统”，尖锐地指出什么孟轲死后所谓“道统”就中断了，什么“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之类的说法，是极端荒谬的。他嘲笑说：从秦到宋以前经历了千多年，如果说“地尽不泉”，人类早渴死了；如果说“人尽不得道”，“人道”早消灭了；如果说这千多年是所谓“混沌无闻”的黑暗时代，这更是“造为谤言”，歪曲历史，应该受到“反坐之刑”。李贽认为，恰巧是程、朱之流狂热鼓吹接续了“道统”的宋代，政治腐败，国势衰微，“奄奄如垂绝之人”。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儒家唯心主义道统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同时，李贽还批判了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命论，经过农民起义和法家唯物主义的不断冲击、批判，从北宋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给天命论以沉重一击之后，逼得以后的儒家代表人物朱熹等不得不变换手法，用“天理”来代替“天命”。所谓“天理”，其实仍然是指有意志的“天”。因此，朱熹有时也露出狐狸尾巴，公开宣称：“帝是理为主”，“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理”，也就是上帝的别名。李贽以嘲弄的口吻质问朱熹：“朱子（熹）曰：‘天

即理也’……夫以天为理可也，而谓祭天所以祭理，可欤？”李贽以当时天文科学的研究水平去解释“天”，说通过观测，可以看到天体的运行“有常度”，断言“夫天者，万物之一物也”。这就剥掉了以往儒家给“天”所加的神学外衣，还天以本来的物质面貌。进而李贽还揭露了朱熹等宣扬“天即理”，天子才能祭天等的反动目的，是为了欺骗和奴役人民。他说：“理之为理，亦大伤民财，劳民力，不若无理之为愈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程、朱之流所讲的“理”，不过是劳民伤财之理，害人之理而已。

李贽从各个方面批判了理学唯心主义，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在七十四岁时（公元1600年），回顾这个斗争的过程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憎恶一切儒家的传统和宗教迷信，不信宗教唯心主义，更不信理学唯心主义，厌恶和尚、道士，更厌恶“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道学先生。

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李贽对于唯心主义理学的批判，反映了地主阶级下层革新派和官僚大地主反动守旧集团之间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受当时农民起义和市民反抗斗争的制约和推动，也是农民和市民反抗官僚大地主集团黑暗统治的斗争的曲折反映。

（二）

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

程朱理学宣扬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朱熹认为，当抽象的绝对的“理”在派生万物的过程中同时也创造了人，人一出世，“理”就好比“月印万川”一样，印到了人的“心”中，于是“心包万理”。所谓人的认识，就是认识“我底（的）道理”，即把心中包含的先验的“理”发挥出来，就可以“豁然贯通”，明白一切。这是十足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李贽在批判程朱理学的斗争中，基本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他认为，人在初生时，只有好比一张白纸的“纯真”的“童心”，而没有任何先天的知识，人之所以有知识，是人们通过耳目等感官接受了外界事物作用的结果。李贽说：“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是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后来，“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人们的知识除了来自直接的感性知识而外，还来自间接经验，即书本知识。“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虽然，李贽在《童心说》里，为了揭穿宋明道学“以假人言假言”的虚伪性，而企图说明要保持“真心”或“童心”，但同时也否认了知识先天就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说明了人的知识来自后天的见闻。

李贽在认识论上的贡献，还在于他提出了真理的相对性问题。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从来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重要问题。宋明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便大搞尊孔活动，明王朝规定“天下儒学，通祀孔子”。明宪宗朱见深学朱熹的腔调，吹捧孔丘是什么“使天不生孔子，……将必昏昏冥冥，无异于梦中，所谓万古长如夜也。”置李贽于死地的明神宗朱翊钧，在《祀孔祭文》中，吹捧得更起劲，什么“道兼群圣，教备六经，历代帝王，是宗是式”。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有意提倡和理学家们大造舆论，孔丘的言论就成为后期

封建社会判断一切行动、评价一切事物的最高的是非标准。

李贽反其道而行之，他敢于亵渎孔丘，打破对孔丘的偶像崇拜，蔑视和否定孔孟之道的绝对权威。他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圣教小引》等文中，尖锐地指出，历代儒家掀起的尊孔潮流，“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是“全无头脑”地瞎起哄，正如一犬吠影，群犬吠声，可笑之至。他进而从理论上提出，决不能把孔丘及其徒子徒孙的话作为识别真理的标准，否定以孔丘的是非为是非。他指出，所谓是和否，真理和谬误，是相对的，是随时代的改变而变化的，不可能用一个抽象的、永恒不变的模式去硬套。他说：“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李贽在封建统治和理学家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的情况下，敢于提出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一脚踢翻以孔丘的是非为是非的封建教条，冲击理学家以孔孟之道作为是非标准的谬论，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贽虽说了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话，但并不是一种否定客观标准的相对主义。他并没有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而使自己陷入绝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他打倒孔丘的权威，而代之以法家的权威；大破儒家传统的是非观，而大立法家的是非观。这是不破不立，破就是立。因此，他在《焚书》、《藏书》中，对八百多个历史人物，作了不以孔丘之是非为是非的评价，他以法家思想，作为评史论政的是非标准，把被儒家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为蒙受儒家攻击、诋毁的历代法家人物翻案雪冤。例如：

孔丘这个被封建统治者吹捧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的“圣人”，李贽却如实地揭露孔丘是一个“无学无术”的草包，灵魂肮脏，生活腐化，“唯酒无量”，是个酒鬼。李贽还明确判定：孔老二所留下的所谓“经典”，“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也。”

历来被儒家及反动统治阶级咒骂为“暴君”、“千古罪人”的秦始皇，李贽却颂扬他是“千古一帝”。他指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如实地肯定了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

历代儒家诬蔑妇女低人一等，并对妇女进行残酷的迫害。李贽与儒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针锋相对，提出男女平等的主张，赞扬寡妇卓文君的自由婚姻；称赞被儒家攻击的武则天“胜高宗十倍”；歌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妇女领袖吕母等“皆的的真男子也”。

仅上几例，便可看出李贽评古论今，为被罢黜的诸子翻案，为被诽谤的法家洗刷，为男女平等呼号，无一不是鲜明地站在法家主张革新前进的立场，打击儒家的守旧倒退路线，在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上具有明确的是非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李贽法家思想的最显明的表现。当然，他不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不理解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使他的真理观还具有严重的局限性。

李贽从进步的平等观出发，坚决反对儒家一贯宣扬的“上智下愚”、“贵贱不易”。他强调指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把“圣人”看成与普通的凡人一样，“圣人”做到的，愚夫愚妇也能做到，愚夫愚妇做不到的，“圣人”也做不到。因此，既不能“高视”圣人，也不要低看愚夫愚妇；不能说圣人、侯王就高贵，愚夫愚妇就下贱，他们是平等的。既然“圣人与凡人一”，那末就不存在“圣人”生知，凡人不能生知的问题。李贽认为，如果说“圣人”生知，那末任何人都能生知，于是便逻辑地得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的结论。既然人人都“生知”，物物都“生知”，也就不存在所谓“圣人生知”和超人的“天才”！李贽在封建统治阶级和理学家为了维护等级制度和欺骗人民，拼命宣扬“天才论”的情况下，

敢于蔑视“天才”，深刻揭露“生而知之”的谎言，在当时起着破除迷信的进步作用。但他的“人人生知”说和他的“童心”说一样，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影响，没有说明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不免带有严重的唯心主义色彩。

(三)

李贽激烈反对程朱理学及整个儒家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儒法斗争在哲学战线上的反映。这场斗争，就其思想的深度和明确性来说，超过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些儒法斗争，并把法家反孔批儒的理论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总结这次儒法斗争和当时整个阶级斗争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

(一) 列宁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李贽生活的明嘉靖、万历年间，封建社会已走向没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在江南沿海一带以某种工场手工业为中心的城镇，逐渐形成早期“市民”的社会势力。由于封建官僚大地主集团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在农民和市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促进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推动了政治、思想领域中革新与守旧、唯物和唯心斗争的开展。李贽代表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政治、经济地位较低而与新兴市民阶层有一定关系的革新势力，他继承以往法家的思想路线，起来向官僚大地主统治集团及其所奉行儒家思想路线展开进攻。他在哲学上的进攻战，不能不表现为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党派斗争的性质。他的哲学思想，也不能不表现出某些新的时代特点，即能够眼睛向下，勇于破旧立新，思想尖锐泼辣，富于战斗精神。

正因如此，当李贽冲杀出来，点名批判孔、孟、程、朱，向整个儒家唯心主义路线猛烈开火，公开宣判“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节徇名者乎！最高之儒，徇名而已”时，就使官僚大地主统治集团胆战心惊，大为震动。他们把李贽视为洪水猛兽，以致当时封建统治的总头目朱翊钧亲自出马，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把七十六岁李贽逮捕下狱，迫害至死，并几次下令焚毁他的全部著作，这表现出封建社会晚期统治阶级在瓦解过程中儒法斗争的尖锐性。同时，由于李贽尊法反儒思想的某些新特点，具有某种吸引力，他生前，已形成所到之处“一境如狂”的社会影响；他死后，其著作冲破封建统治者的禁令而大为流行，“虽奉严旨，而其书行于人间自若也”。李贽思想的批判精神，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对后来兴起的反封建启蒙思潮还有着积极影响。这表明封建社会晚期的法家思想中的某些可贵的因素，对后来新思想的孕育是起着酵母的作用。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李贽对于孔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不可能真正揭露孔学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因此也不可能彻底批判唯心主义理学。同时，作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思想代表，他没有也不可能把他的斗争同当时农民和市民的反理学斗争结合起来。所以，尽管他斗争很坚决，“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但在新的革命阶级还没有真正形成并起来实行推翻封建统治之前，他既找不到力量，也看不见前途，因而不免陷入苦闷和彷徨。他在《夜半闻雁》这首诗里写道：“孤鸿向北征，夜半犹哀鸣，哀鸣何所为？欲我如鸿冥。独雁虽无低，群飞尚有伴，可怜何处翁，兀坐生忧患！”正因为这样，他晚年企图从佛学中去寻找幻想的解脱和“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又受了王守仁心学的某些影响，所以在他的哲(下转第86页)

当反上”的革命变革思想，号召受尽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的下层劳动人民起来造反，推翻统治者，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黄巾起义的战斗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正是从这种朴素的矛盾转化观所得出的光辉结论。它告诉劳动人民，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苍天”已经死去，代表农民阶级的“黄天”应当建立。在社会矛盾尖锐到极点的甲子年起来革命，完全符合“自然之数”，一定能够成功。这就充分表现了黄巾起义军在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推翻旧政权、创造新天地的革命英雄气概。

每次农民起义，都给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一个个封建王朝的瓦解和更替，都是农民起义的结果。革命农民经过长期的阶级斗争，逐步认识到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在黄巾起义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是一首气壮山河的战歌。它向统治阶级宣布，起义军的革命是正义的，是吓不倒、杀不尽、后继有人的。同时告诉劳动人民，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不是神仙皇帝，不是地主官僚，而是劳动人民自己。反动派没有什么可怕，人民力量才大如天。这种相信人民、不畏强暴的革命史观，对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反动史观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为起义农民变革社会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豪强地主的残酷镇压下，黄巾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它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神权、政权、族权、夫权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狠狠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的反动政策，使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迫使魏晋时期的门阀豪族不得不借助玄学来挽救孔孟之道。这次黄巾起义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纲领上，都比过去历次农民起义有显著发展，对后来的农民革命和儒法斗争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全文未完，待续)

.....

(上接第 91 页)学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唯心主义的杂质和理论上的自我矛盾，甚至在有些问题上，陷入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泥坑。这是当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下层革新派在政治上软弱性、摇摆性和改革的不彻底性的必然反映。

人类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才可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真正科学的世界观，也才能彻底揭露、批判孔孟之道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今天，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取得不断的胜利。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旧社会的死尸和臭气还依然存在，国内外阶级敌人还会利用儒家唯心主义黑线来搞复辟活动。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站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深入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